

148

經濟學

1991

4

148



新 书 介 绍

《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

本书精练地介绍了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全书共分十篇论文，分别由W.A.刘易斯，克林·克拉克、罗森斯坦—罗丹、W.W.罗斯托等十位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撰写，其中论述了每位发展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思想进展及当前最新认识。本书内容广泛，从宏观、部门结构和微观三个层次综述战后经济发展理论的进程。每篇论文后还有当代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的评论。堪称是发展经济学的百科全书。

本书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一定会相当有益。

本书对大专院校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部门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企业管理等专业师生及有关研究与实际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书共约35万字，由吉拉德·M·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编，1985年世界银行出版。欲购者请到北京大学出版社教材科教材零售部(北大校园内)购买，单价8.50元。

经济科学

(双月刊)

一九九一年第四期

名誉主编：陈岱孙

主 编：刘方城

副主编：张德修

编 委：刘 伟

刘方城 巫宁耕

何小锋 林顺宝 张德修

范家骥 洪 宁 高程德

梁钧平

编 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科学》编委会(100871)

出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印 刷：北京市北下关印刷厂

国内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内代号：2—840

国外代号：BM262

国内统一刊号：CN11—1564

1991年8月20日出版

定价：2元

目 录

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理论指南

——学习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一点体会·····蒋宝祺 赵一明(1)

中国宏观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趋势分析·····张德霖(7)

我国劳动市场的涵义、特征和发展模式初探·····赵石宝 杨敏(17)

论宏观调控的内涵及它的中观、微观基础·····吴敏一(23)

生产力发展基本规律探索·····唐晓阳(28)

·读书札记·

论马克思的货币价值观和货币数量公式

——学习《资本论》的宏观分析札记·····赵志平(32)

储蓄、消费与社会总供求平衡·····胡继之(37)

消费选择倾斜及对策分析·····白国华(44)

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分析·····杨伟民(48)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几个问题·····许宪春(55)

我国企业的目标函数和工资成本

——对《我国企业的供给行为》一文的高权·····孙来祥(59)

论民办高技术产业中的创新主体·····厉伟(63)

八十年代美日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剧变的原因·····王俊宜(69)

·书评·

第三产业经济理论的系统探索

——李江帆著《第三产业经济学》评介·····赵瑞彰 赵学增(75)

Economic Science (Bimonthly)

Editor: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of Peking University

NO. 4 1991

Serial NO. 65

-
- The Theoretical Guide to the Caus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Policy of China
—— Learning Deng Xiaoping'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Thought.....Jiang Baoqi and Zhao Fuming (1)
- An Analysis of the Trend of Changing Rates of Labour Productivity in
China.....Zhang Deling (7)
- A Preliminary Inquiry on Implications, Special Features and Developing
Models of China's Labour Market.....Zhao Shibao and Yang Ming (17)
- The Connotation of Macro-economic Control and its Mediate-economic
and Micro-economic Bases.....Wu Minyi (23)
- An Inquiry into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ang Xiaoyang (28)
- Reading Note: On Marx's Theory of the Value of Money and His Formula
of Money Quantity.....Zhao Zhrping (32)
- Saving Consumption and the Equilibrium of Aggregate Supply and Agg-
regate DemandHu Jizhi (37)
- Inclination of Consumers' Option and Analysis of its Countermeasures
.....Blai Guohua (44)
- An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Rura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 Yang Weimm (48)
- Problems in National Economy Accounting in China Xu Xianchun (55)
- The Objective Function and Wage Cost in Chinese Enterprises
—— Discussion on Lin Yixiang: 《The Supply Behavior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Sun Liaxiang (59)
- On the Principle Innovative Factors of the High Technology in Private
EnterprisesLi Wie (63)
- Causes of the Violent Change in the Comparative Economic Strength
between Japan and the U.S. in 1980s..... Wang Zunyi (69)
- An Systematic Inquiry into the Theories of the Third Industry
—— A Book Review on Li Jiangfan: 《Economics of the Third
Industry》.....Zhao Riezhang and Zhao Xuezheng (75)
-

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理论指南

——学习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一点体会

国防大学 蒋宝祺 赵一明

一、邓小平同志深刻论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1979年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的观念由封闭转为开放，整整跨越了一个时代。邓小平同志对这一重大的观念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

当我们的民族在“四人帮”的蛊惑和愚弄下，处于狂热状态时，身处逆境的邓小平同志却在冷静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1974年他恢复工作以后不久，针对“四人帮”闭关锁国的做法，旗帜鲜明地提出，“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这是一个大政策”。^①粉碎“四人帮”以后，小平同志针对我国长期的封闭造成的愚昧、僵化、并针对人们的担心和种种误解深刻地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首先，小平同志如实地指明了我们的落后状况，他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几亿人口摘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我们的新兴工业和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②这些实事求是的分析，极大地清醒了人们的头脑，纠正了在长期封闭状态中形成的夜郎自大的盲目情绪。

其次，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③小平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这个问题作了极其深刻和精辟的分析。他说，我们吃过闭关自守的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正是这种闭关锁国，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这是对我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我们的历史证明，从秦汉至明清，凡是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总是与对外经济交流活跃相联系的，而国力衰弱、经济停滞又往往与实行闭关政策分不开。

小平同志回顾和总结了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指明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是发展不起来的。必须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落后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激励我们奋发图强，虚心学习，迅速掌握和赶上世

①《邓小平文选》，第29页。

②见《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82—88页。

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

界最新的科学技术水平。因此，只有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只有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小平同志正是在客观分析世界和中国的现状、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外开放这一伟大决策的。

第三，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对外开放，我国不可能实现四化，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

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以后，邓小平同志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对外开放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政策之一。^①

小平同志首先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阐明这个问题的。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吸引过来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他强调，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善于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为了批判所谓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阶级投降”的谬论，解放大家的思想，小平同志进一步指明了科学技术的性质。他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这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近年来小平同志根据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又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些论述不仅把人们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也为我们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实践证明，科技进步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60%。这一趋势要求我们要强化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抓好老企业的技改，引进有效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高技术，开展技术协作攻关，并重视软科学的应用与发展。

小平同志还对对外贸易与翻两番的关系分析对外开放的意义。他说，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是400多亿美元吧？这么一点进出口贸易额，关起门来能翻几番呀？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什么都要自己制造？还不是要从外面买进来一批，自己卖出去一批？可以说，没有对外开放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

小平同志进而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这一广阔视野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②，“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③。在开放的世界里，各国必须通过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弥补自己的劣势，从而推动本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④

第四，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对外开放是必由之路。

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它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最终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为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应当是有后劲的。要有后劲，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和基础工业、农业建设。这些需要大量资金。而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00年，我国固定资产净投资所要资金缺口约为40%。因此，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要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

从科学技术方面看，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工业中大部分技术装备陈

^①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5—69页。

^{②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4页、第77页。

^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

旧，管理方法落后，技术进步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仅占20%左右，而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60%。我们积极引进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技术和科学，就可以在较高的起点上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以我国的电子工业为例，1979年以来，共引进2000多项国外技术和设备，用汇16亿美元，使1/3重点企业得到技术改造，技术水平一步跨越了近20年。彩电显象管、线性集成电路、铭板、计算机、磁盘机和关键元器件等20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相继投产，加强了我国电子工业的技术基础，形成了新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产品技术性能有30%达到国际80年代初的水平。整个电子行业的产品可靠性提高了10倍。有十几种电子产品在国际上获金奖。

第五，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不会伤害社会主义事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

要意识到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特别要注意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但这些东西，不是不可克服的。他特别就引进外资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问题，做了科学的分析。他说，同外国人合资经营，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不管怎样开放、外资进来多少，它占有的份额还是很少的，影响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

小平同志从上述论述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外开放胆子要大要坚决。对外开放不是短期的政策，要稳定，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

二、邓小平同志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制定了重要的战略、策略和方针

邓小平同志不仅力主和倡导对外开放，而且制定了重要的战略、策略和方针，指导和组织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第一，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不只是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开放。对这些国家开放，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一共三个大方面。”^①这一全方位开放的思想，符合国际国内的经济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因此，“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②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比我们发达，技术上各有特点，资源和产品各有优势，因此可以做生意、搞技术合作，甚至搞合资经营、技术改造。^③

第三世界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④可以开展从商品贸易、技术贸易到合资经营、合作生产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往来。从长远看，中国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对于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有着重要的影响。

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不仅拓展了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领域，有利于促进我国西北、东北以至西南各省区的整体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促进欧亚两大洲的经济交流，加强我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着深远的意义。它还可以避免我国的经济受制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这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3页。

^{②③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7页。

确实是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

第二，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

根据小平同志的倡议，1979年7月中央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经济特区”。

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并肯定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的工作，并且赞同蛇口工业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他要求特区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他建议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资金可以自由出入，肯定益处很大。他的题词和支持，也促进了海内外对特区投资高潮的到来。

小平同志视察归来后，即召集几位中央领导商谈经济特区和增加沿海开放城市问题。他指出，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可以在现在的特区之外，再考虑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样做，肯定是利多弊少。还要开发海南岛，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根据这一倡议，1984年4月，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并把厦门特区扩展到厦门全岛。这样继四个经济特区以后，沿海开放城市又形成了对外开放的第二个层次。

1985年8月，小平针对特区出现的问题（主要是能出口的好产品不多）指出，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发展出口，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健康的。

各个特区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制定了“上水平，求效益，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四个经济特区都初步形成了外向型经济的格局。充分证明中央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第三，要大胆利用外资，创造合理的、优越的投资环境。

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四化建设缺少资金的问题，在1978年即提出要引进资金，加速我们的发展。这就打破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优越性的老框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又多次就吸收外资的规模、形式及外资投向发表意见，要求在利用外资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他还见了多位海外著名实业家探讨和推动在中国投资的问题。

小平同志还针对投资环境不理想的缺陷，提出我们要大胆地利用外资，为外商创造合理的、比较好的条件。这是我们的方针。很简单的道理，让人家来投资，不赚钱是不行的，当然，开放条件和投资条件也要合理，赚得太多也不行但自前的关键问题还是环境不好。根据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意见，1986年，全国人大、国务院就进一步为外商投资提供优惠条件作出了22条新的规定。随后，中央有关部门又制定了实施这些规定的细则，各地区也都相应地采取吸引外资的新措施，从而使投资环境有了较快的改善。1979年至1988年6月，我国对外借款项目已达295个，协议金额397.28亿美元，实际使用320.75亿美元；吸收外商投资项目达12161个，外商投资协议金额281.51亿美元，实际使用120亿美元。两项相加，近十年我国利用外资协议金额678.79亿美元，实际使用440.75亿美元。这些外资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既重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也要注意外国智力的引进。

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还特别提出，要利用外国的智力，把外国人请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办教育，搞技术改造。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不要怕花几个钱。我们现在搞现代化建设，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应该把他们

请来帮助。根据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有关引进智力的决定。引进智力的形式越来越多，方法越来越灵活。诸如：①聘请外国知名专家和学者担任各级政府部门的技术顾问。②聘请外国专家参与重大工程项目，如长江三峡工程、大亚湾核电站等的可行性研究。③聘请外国人担任某些企业的经理、厂长，传授科学的管理经验。④由外国人单独举办或中外双方共同举办技术和管理培训中心，短期培训班等，为中国培养各类专门人才。⑤召开有关经济、科技、法律、教育等各种专题的国际研讨会，请各国专家为中国的建设和改革献计献策。⑥中外专家合作进行科技和经济方面的某些重大课题的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与引进技术、引进设备相辅相成，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对加速四化建设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三、邓小平同志为我国的对外开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和措施的基本前提，对外开放也是在坚持这个前提下开展的。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思想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①为了坚持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确立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

第一，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

邓小平同志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②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依靠我们自己的人民长期奋斗，就一定能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第二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底子薄、人口多、科学技术落后的穷国，任何国家的援助都解决不了我们的根本问题。第三，某些外国不愿意我国发展经济。他提醒说，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然要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是对外开放的基础，而对外开放又有利于增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

第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各国的事情应当由他们自己去解决，不应当由别人去发号施令，在对外交往中要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民族利益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决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也不允许其他国家损害我国民族利益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决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也不允许其他国家损害我国民族利益，彼此必须平等互利，互守信用地发展经济往来关系。

邓小平同志确定的上述这两条原则，显示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立场和丰富斗争经验。他清醒地看到，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严正宣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7页。

^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页。

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①

经过前年“两乱”风波，人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两条原则有力地阻遏了某些西方国家企图利用中国对外开放之机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阴谋；保证了对外开放条件下中国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大国地位；也使一些西方国家以所谓经济制裁来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破了产。

第三，实行开放政策，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还在我国对外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预见到这一点。他提醒人们，我们党内、国内本来就有一些非社会主义思想，加上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反复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从1979年到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有三次大的高潮，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针对1979年的所谓“北京之春”，小平同志发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谈话，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针对1986年底由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煽动而在28个城市发生的学潮，小平同志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谈话。他批评了党内当时某些高层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错误，明确指出“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②针对1989年的政治动乱，小平同志发表了三次谈话，一方面深刻分析了动乱的原因，揭露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制造这次动乱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另一方面他再次重申要坚定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他说，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我们的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好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他的灼见，为我们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对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第四，坚持两手抓和两点论。

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邓小平同志就与广东省的领导同志说，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在1982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同年7月的军委座谈会上，小平同志又强调这个原则。他说，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

这里，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两点论。既看到对外开放的意义，也看到它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他提出“两手抓”，为的就是消除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然而，这一正确原则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结果是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使各类经济犯罪活动得以蔓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横行无忌，严重干扰了对外开放大局。

总之，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的论述，关于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和方针以及关于对外开放的原则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的统一整体。人们不应把它割裂开来，片面地加以理解和运用。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页。

^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51页。

中国宏观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趋势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德霖

劳动生产率是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投入量与其相应产出量相比较的效益和效率关系的反映,是现实劳动生产力的规定性的量的客观描述和测量尺度,劳动生产率可以在不同经济层次上进行分析。本文将在宏观层次上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

一、宏观社会劳动生产率分析内容

1. 劳动生产率及增长的贡献率计量模型。本文所计算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公式是: 社会劳动生产率=国民收入/社会劳动者平均人数, 即 $PL=O/L$ 。这里, 舍象了劳动者个人能力及贡献等方面的差别, 即质的差别, 只考察劳动者投入量的变动对相应产出量的影响。

根据统计学原理,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模型是: $dO=dL+dPL$ 。这一模型与哈罗德—多马自然增长模型相一致^①。由此可得: $dL/dO+dPL/dO=1$ 。令 $C(L)=dL/dO$, $C(PL)=dPL/dO$, 那么, $C(L)$ 就是劳动力投入量平均增长率在产量平均增长率中所占贡献份额, 即贡献率。同理, $C(PL)$ 就是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对产出量平均增长率的贡献率。需要注意, 这里是设定产出量平均增长率的变化完全归于劳动力投入量及其使用效率即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

2. 平均增长率的计算。本文一律按“水平法”计算社会劳动生产率及其相关变量的平均增长率。

3. 变量排列与经济类型。在劳动生产率计量模型中, 投入、产出与劳动生产率三组变量与根据样本数据得出的某一基准值(本文按加权平均)相比较, 它们可能会分别高于或低于该基准值, 由此诸变量可以合理地(符合经济学和数学意义)排列为两个档次六种经济类型: 高效型——最佳型(高产出低投入高生产率型)、高产出高投入高生产率型、低产出低投入高生产率型; 低效型——最差型(高投入低产出低生产率型)、高产出高投入低生产率型、低产出低投入低生产率型。一般说来, 高效型相对属于内涵型经济发展, 而低效型则相对属于外延型经济发展。

4. 劳动生产率弹性系数与相关系数分析。弹性是指一变量对另一变量的微小百分比变动所做出的反应。劳动生产率弹性是指劳动生产率变动对产出量变动的的影响程度。劳动生产率弹性系数则是对这种变动关系的数量描述。其计算公式是: 劳动生产率弹性系数 $[E(PL)] = \text{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 / \text{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 。

相关性是指变量之间相互关联及其变化的程度。劳动生产率相关性是指它与产出量相互关联的变动态势。劳动生产率相关系数则是这种联动关系的数量描述。其计算公式是:

^①参见宋承先、范家骥,《增长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6页。

$$R = \frac{\sum_{i=1}^n (PL_i - \overline{PL})(NI_i - \overline{NI})}{\sqrt{\sum_{i=1}^n (PL_i - \overline{PL})^2 \sum_{i=1}^n (NI_i - \overline{NI})^2}}$$

R: 劳动生产率相关系数; NI: 国民收入。

5. 计算时限与分期。本文选定的计算时限是1953—1988年, 1952年为基年, 共36年。社会劳动生产率是按指数换算成1980年价格计算的。

为了分析中国宏观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时间结构变动趋势, 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的不同标志的分期。本文按三个标志分期。一是按国家计划期标志分期, 依次分为“一五”时期、“二五”时期……。目的是考察并分析国家计划期内劳动生产率及其相关变量的变动趋势。二是按“文革”标志分期, 相应地分为“文革”前(1953—1966年)、“文革”中(1967—1976年)和“文革”后(1977—1988年)。目的是考察并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史的特殊发展时期前后的劳动生产率及其相关变量的变动趋势。三是按“改革”标志分期, 分为“改革”前(1953—1978年)和“改革”中(1979—1988年)两个时期。目的是考察并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前后的劳动生产率及其相关变量的变动趋势。

二、宏观社会劳动生产率分析结论(1)

根据上述分析内容和计量模型, 得出如下分析结论。

1. 指数分析。从指数(环比增长速度和定基发展速度)来看(表1), 总的说来, 1953—1988年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反映在定基发展速度上, 36年间增长了3.249倍。而且从1978年以后, 定基发展速度一直呈平稳上升的势头。从环比增长速度看, 36年间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艰难曲折的。这反映在图1中。该图所显示的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曲线不是一条平稳上升的曲线, 而是一条连年上下波动、时起时伏的“振荡”曲线。环比增长速度和图示还表明, 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平衡、大波幅(波峰与波谷的距离)。最高年份(1970年为18.7%)和最低年份(1961年为-28.9%)相差47.6个百分点。36年中, 有7年份的环比增长速度为负值, 在总时期中占19.4%。其中“二五”时期3/5的年份和“三五”时期的2/5年份是负增长。总之, 1953—1988年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数变动的总趋势是: 在频波动、大波幅中不平衡地增长。

2. 平均增长率分析。由表2可见, 在国家计划期内, “三年调整”时期情况最好, 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高达11.3%; 其次是“七五”前期(1986—1988年), 其平均增长率为6.8%。作为一个完整的五年计划时期, “一五”时期情况最好, 其平均增长率为6.3%; 其次是“六五”时期, 平均增长率为6.1%。情况最差的是“二五”时期, 出现了计划期内的唯一一次负增长(-5.0%)。在按“文革”标志分期中, “文革”后12年的情况最好, 其平均增长率为6.4%。“文革”10年情况最差, 其平均增长率仅为2.1%。分别低于“文革”前后两个时期1.5和4.3个百分点。在按“改革”标志分期中, “改革”10年的情况(其平均增长率6.0%)。显然好于“改革”前26年(其平均增长率为3.4%); 两时期相差2.6个百分点。在总时期内, 1953—1985年的平均增长率为3.9%, 1953—1988年的平均增长率为4.1%。总之, 在36年间, 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低于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6.9%); 其中发展最顺利的时期是“一五”时期、“三年调整”时期和十年改革时期, 其年份数在总时期中占50%(18年)。

表1 1952—1988年中国宏观社会劳动生产率及指数（按国民收入计算）

年份	时点数 (元/人·年)	环 比 增长速度%	定期发展 速度%	年份	时点数 (元/人·年)	环 比 增长速度%	定期发展 速度%
1952	345	0.0	100.0	1971	644	3.4	186.7
				1972	649	0.8	188.1
1953	387	12.2	112.2	1973	693	6.8	200.9
1954	399	3.1	115.7	1974	686	-1.0	198.8
1955	415	4.0	120.3	1975	728	6.1	211.0
1956	462	11.3	133.9				
1957	468	1.3	135.7	1976	695	-4.5	201.4
				1977	738	6.2	213.9
1958	530	13.2	153.6	1978	818	10.8	237.1
1959	548	3.4	158.8	1979	862	5.4	249.9
1960	547	-0.2	158.6	1980	894	3.7	259.1
1961	389	-28.9	112.8				
1962	363	-6.7	105.2	1981	968	1.6	280.6
				1982	952	4.8	275.9
1963	394	8.5	114.2	1983	1014	6.5	293.9
1964	444	12.7	128.7	1984	1116	10.1	323.5
1965	501	12.8	145.2	1985	1203	7.8	348.7
1966	565	12.8	163.8	1986	1260	4.7	365.2
1967	505	-10.6	146.4	1987	1353	7.4	392.2
1968	457	-9.5	132.5	1988	1466	8.4	424.9
1969	525	14.9	152.2				
1970	623	18.7	180.6				

〔本资料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1978—1987)有关资料按指数换算成1980年价格计算的。〕

表2 各发展时期中国宏观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贡献率及弹性系数

发 展 时 期	平均增长率%			贡献率%		E (PL)
	NI	L	PL	C (L)	C (P)	
I. 按国家计划期标志分期						
“一五”时期	8.9	2.4	6.3	27.6	72.4	0.71
“二五”时期	-3.1	2.0	-5.0	66.7	-166.7	1.61
1963—1965年	14.7	3.0	11.3	21.0	79.0	0.77
“三五”时期	8.3	3.7	4.5	45.1	54.9	0.54
“四五”时期”	5.5	2.4	3.1	43.6	56.4	0.56
“五五”时期”	6.1	1.8	4.2	30.0	70.0	0.69
“六五”时期”	10.0	3.6	6.1	37.1	62.9	0.61
1986—1988年	9.6	2.7	6.8	28.4	71.6	0.71
II. 按“文革”标志分期						
“文革”前 (1953—1966年)	6.1	2.5	3.6	41.0	59.0	0.59
“文革”中 (1967—1976年)	5.0	2.9	2.1	58.0	42.0	0.42
“文革”后 (1977—1988年)	9.4	2.8	6.4	30.4	69.6	0.68
III. 按“改革”标志分期						
“改革”前 (1953—1978年)	6.0	2.6	3.4	43.3	56.7	0.57
“改革”中 (1979—1988年)	9.2	3.0	6.0	33.3	66.7	0.65
总时期(1953—1985年)						
	6.6	2.7	3.9	40.9	59.1	0.59
(1953—1988年)						
	6.9	2.7	4.1	39.7	60.3	0.59

3. 劳动生产率弹性系数和相关系数分析。在国家计划分期内，除“二五”时期外，“一五”时期和“七五”前期的劳动生产率弹性系数最高(E (PD)均为0.71)。这表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对国民收入产出的变动有着较高的反应灵敏度，同时也说明这二者的变化有着

较强的同步性。全部分期的平均弹性系数 $E(PL)$ 为0.775。另一方面,在国家计划期内,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有着极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 $R=0.9936$ 。

在按“文革”标志分期中,除“文革”后12年中的劳动生产率弹性系数较高外($E(PL)=0.68$),余者的前两个分期都偏低,尤其是“文革”10年期间,其弹性系数仅为0.42。这表明这一时期内劳动生产率变动对产出变动的反应灵敏度大大降低。整个分期内的 $E(PL)$ 仅为0.54,这也说这一时期内劳动生产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步性较差。

在按“改革”标志分期中,“改革”前的劳动生产率弹性系数(0.57)明显低于“改革”后的水平(0.65)。这表明,十年改革期间劳动生产率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反应灵敏度有明显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国民收入的同步性也随之加强。

总之,1953—1988年36年间,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不仅对产出增长有着较强的反应灵敏度,而且这二者还有较高的相关性。这充分表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劳动生产率的升降直接影响到国民收入的增减变动。

4. 贡献率分析。在国家计划期内,劳动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贡献最大的时期是“三年调整”时期, $C(PL)=79\%$ 。其次是“一五”时期($C(PL)=72.4\%$)和“七五”前期($C(PL)=71.6\%$)。最差的时期是“二五”时期,出现了高额负贡献($C(PL)=-166.7\%$)。

在按“文革”标志分期中,“文革”后12年的贡献率最高, $C(PL)=69.6\%$ 。十年“文革”依然最差, $C(PL)$ 仅为42%。在总时期内,这是唯一的一次劳动力投入量增长的贡献率($C(L)=58\%$)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

在按“改革”标志分期中,十年改革期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贡献率为66.7%,高出改革前26年水平($C(PL)=56.7\%$)的10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前的时期里,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更大程度地依赖劳动力投入量的增长。

在总时期内,1953—1985年33年间,中国劳动力投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0.9%和59.1%;而在1953—1988年36年间,这二者的贡献率分别变化为39.7%和60.3%。若将国家计划期各分期的水平加以简单算术平均,那么1953—1988年劳动力投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8.3%和61.7%。简言之,在1952年以后的36年间,中国劳动力投入量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分别约为40%和60%,或4:6。这表明,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劳动力投入量增长的贡献。这也说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意味着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保证并加快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基本途径。

就中国来看,之所以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劳动力投入增长的贡献率,其原因之一是36年间我国劳动力增长相对比较平稳,其平均增长率为2.7%。这样,在产出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劳动力的增长,从而使前者的贡献率超过了后者的贡献率的增长。当然,总产出量的增长并不完全归功于劳动力及劳动生产率,还依赖于资金,技术进步等增长因素。因此,只有通过综合生产率的变动趋势,才能全面地阐明诸变量之间的关系。不过,这里的贡献率分析,依然印证了前面的结论的正确性。

5. 变量排列与经济类型分析。 $C(NI)$ 、 L 、 PL 的基准值的确定办法是:首先计算出按不同标志分期的各时期的诸变量平均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权数为年份),然后结合总时期的平均增长率水平加以修正(算术平均),由此可得: $NI\%$ 基准值为6.9%, $L\%$ 基准值为2.7%, $PL\%$ 基准值为4.1%。根据上述基准值和表2的数据,得出了表3,即中国宏观社会

劳动生产率诸变量排列与经济类型。

表3 各发展时期中国宏观社会劳动生产率诸变量排列与经济类型

发 展 时 期	经 济 类 型	在各标志分期中所占比重抗
I. 按国家计划期标志分期		
“一五”时期	最佳型	13.9
“二五”时期和“四五”时期	低产低投低效型	27.8
三年调整、“三五”和“六五”时期	高产高投高效型	36.1
“五五”时期	低产低投高效型	13.9
“七五”前期	高产高投高效型	8.3
II. 按“文革标志”分期		
“文革”前(1953—1966年)	低产低投高效型	38.9
“文革”中(1967—1976年)	最差型	27.8
“文革”后(1977—1988年)	高产高投高效型	33.3
III. 按“改革”标志分期		
“改革”前(1953—1978年)	低产低投低效型	72.2
“改革”中(1979—1988年)	高产高投高效型	27.8

由表3可见：(1)我国经济发展的曲折性。在36年间，其经济发展蕴涵着各种经济类型，其中既有令人亢奋不已的最佳型，又有使人忧虑万分的最差型。(2)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国家计划期内，“高产高投高效型”有13个年份，占总年份的36.1%，“低产低投低效型”有10个年份，占总年份的27.8%。这两种经济类型均高居榜首。由于这两种类型的经济内涵和发展意义恰好相反，因而，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忽高忽低的不平衡性，高至巅峰（如“一五”时期的最佳型），低到渊谷（如“文革”10年的最差型）。(3)经济的高速运行。36年间，“高产高投高效型”占主导地位。如果把“七五”前三年也划作此类型，那么，属于高速增长类型有16个年份，在总时期中占44.4%。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置于高速度运行状态。

综合上述五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将1953—1988年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归纳如下：就环比增长速度而言，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在频繁波动、大振幅中不平衡地增长的；就定基发展速度而言，社会劳动生产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1978年以后，这一增长趋势更为显著；就平均增长率而言，社会劳动生产率始终是在低于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速度中变动，其中增长势头比较理想的时期是“一五”时期、“三年调整”时期、“六五”时期和“七五”前期，其中“一五”时期和十年改革时期尤为显著；而其余一半以上的年份都不尽如人意；就弹性系数、相关系数和贡献率而言，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不仅对产出量的变动有着较高的反应灵敏度和相关性，而且其贡献率超过了劳动力投入增长的贡献率，这意味着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中国国民收入最重要的源泉和最基本的途径。就变量排列与经济类型而言，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属于曲折、不平衡的高速度运行状态。

三、宏观社会劳动生产率分析结论（I）

产业劳动生产率是宏观劳动生产率变动趋势的具体化和补充说明。为此，本文特别考察了十年改革期间中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除产出量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外，其余变量的各分析内容的计算方法均同上。

1. 指数分析，由表4可见，就环比增长速度来说，1978—1988年中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轨迹是三条“振荡”曲线。这一变动趋势表明了两点：其一，十年改革期间中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始终处在上下频繁波动状态，其增长很不平衡。其中波动幅度最大的是第三产业，1981—1982年的“振幅”达21.6个百分点。其次是第一产业，1984—1985年的“振幅”为15.1个百分点。同时，第一产业还两度（1980年和1985年）出现了负增长，在总年份中占20%。其二，十年改革期间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波动周期恰好与同期出现的三次经济过热和紧缩周期（1984年1月—1986年3月、1986年4月—1988年2月、1988年3月开始）基本相吻合^①。这表明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效率的高低，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又反过来成为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否顺畅平稳和充满活力的直接指示器。

从定基发展速度（表4）看，1978—1988年中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变动基本上呈三条平稳上升的曲线。这表明，十年改革期内，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势头喜人。但是，就波动性而言，1978—1982年期间，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波动较大，这反映出改革初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就发展水平而言，1982—1987年期间，发展水平最高的产业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居末。不过，最后获得冠军的却是第二产业（164.1%）。第三产业虽然居末，但增长曲线最为平稳。第一产业虽然在大部分时期里处于领先地位，但1984年前后出现了较大波动。这说明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时，的确给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振荡。

2. 平均增长率分析。根据中国十年改革的进程，我们把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78—1984年，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农村经济改革；1985—1988年，这一时期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

首先，从平均增长率的高低位次的排位变动情况看，1978—1984年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的位次与其自然位次相同，即第一、二、三产业对应于第一（6.0%）、二（3.5%）、三（2.1%）排位。到1985—1988年，其位次发生了变化和换位，由上期的“一二三”排位，交换为“二三一”排位。即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由上期的第二位移至第一位（7.5%）、第三产业由上期的末位升至第二位（5.7%），而第一产业却由上期的冠军退居第三名（1.7%）。在总时期内，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排位是“二一三”，即第二产业居首位（5.1%）、第一产业居中位（4.3%）、第三产业居末位（3.5%）。

其次，从平均增长率的增长变动幅度看，第一产业降低幅度最大，由1979—1984年的6.0%下跌到1985—1988年的1.7%，下跌了4.3个百分点，比总时期的4.3%的平均水平还低2.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长幅度最大，由1979—1984年的3.5%，升至1985—1988年的7.5%，上升了4.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幅度也比较大，上升了3.6个百分点。

从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动情况看，它至少给我们两点重要启示：

其一，经济改革进程和改革战略的转变，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变动有极大的影响。

^① 参见张嘉：《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的几个问题研究》，《经济研究》1990年第11期。